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

——以功能建构为视角

余旸 ◎著



人民出版社

“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

——以功能建构为视角

余旸◎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岳改苓

封面设计:九 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余旸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047-4

I. ①九… II. ①余…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2333 号

“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

“JIUSHI NIANDAI SHIGE” DE NEIZAI FENQI

——以功能建构为视角

余 旸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48 千字

ISBN 978-7-01-016047-4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顾 问：黄蓉生 张卫国 崔延强 靳玉乐

主 编：吕 进

副主编：熊 辉

编 委：（按音序排列）

陈本益 段从学 江弱水 靳明全

蒋登科 李 震 梁笑梅 陆正兰

吕 进 王 珂 王 毅 向天渊

熊 辉 颜同林 张崇富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导 论 001

第一章 臧棣：从“不纯诗学”到“可能性”诗学 013

第一节 “不纯诗学” 016

第二节 社会专业化进程下的不同诗歌想象 027

第三节 “可能性”诗学的矛盾 039

第二章 张枣：“文化身份”的困扰 052

第一节 “传统/现代”的争论与分歧 053

第二节 建构“传统”：“日常磁场之神”的缺失 059

第三节 重构“传统”：“文化身份”认同 070

第四节 “传统”阐释的危险 080

第五节 “汉语性”——文化帝国的语言 090

第三章 肖开愚：内向辨认的“政治” 104

第一节 “中年写作”的限度意识 106

第二节 “针对性”诗学 119

第三节 内向辨认的“政治” 137

第四节 斡旋实效的“官僚” 146

第四章 “历史意识”与“可能性”的限度	162
第一节 “历史意识”的不同阐释	163
第二节 “历史意识”的内在分歧	170
第三节 “可能性”及其限度	181
附录一 诗歌界的“南北之分”?	193
附录二 诗歌与伦理的诠释性关系	228
附录三 “技艺”的当代政治性维度	256
参考文献	301
后 记	309
丛书后记	311

导 论

1999年“盘峰论争”后，作为一种较有影响的诗歌现象，“九十年代诗歌”已告一段落。但进入21世纪以来，围绕近十几年涌现的诗歌现象展开的争议与思考，却仍然纠结在“九十年代诗歌”所呈现的问题意识与思路中。可以说，在变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活跃着的还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而争议热点，与其最为核心的两个诗学概念——“历史意识”与“可能性”有密切关联。

“历史意识”，也即诗歌如何承担历史、介入现实的问题，有时又被理解为诗歌对“历史”的处理能力，在新诗史上并不是个陌生的话题。无论是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诗人，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部分诗人，都通过积极的写作实践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某种解答。但就诗学意识与社会历史之间复杂的纠葛而言，由于中国新诗的特殊进程，“历史意识”这一概念又带有“九十年代诗歌”独特的历史印迹。具体来说，“朦胧诗”后，伴随着对意识形态的抗议与疏离，一种超越历史、强调诗歌独立的审美功能的诗歌观念，在诗人中获得了普遍认同，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动驱使部分诗人反思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非历史化”的纯诗倾向，表达了使文学恢复“向历史讲话”的共识。而诗歌对历史的处理能力，也即“历史意识”，就转变为“九十年代诗歌”最为核心的诗学观念，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随后十多年涌现的诗歌新倾向，无论对之总结命名，提出一些代际概念并进行阐释建构，还是激烈地抨击批评，众多评论往往都以“九十年代诗歌”的诗学观念为参照，牵涉到的问题又总与“历史意识”有关。

以诗人批评家陈超为例，他批评当下诗歌写作“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的日益薄弱”时，就以“九十年代诗歌”的“创造力状态”为标高，

呼吁“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①。2006年,林贤治试图推举包括打工诗人郑小琼在内的新诗人,与之相对,“九十年代诗歌”则被笼统指斥为“技术至上”,不能反映时代的苦难,表现出缺少“灵魂与良知”的状态。林贤治较为偏狭的批判引起诗人臧棣的激烈驳斥,中心也仍然围绕诗歌与“社会现实”也即“历史”的关系。与这一争论有关联,最近几年兴起的“底层写作”现象往往引起了相反的意见,在高度赞扬或激烈批评中,“九十年代诗歌”与“底层写作”往往构成两个极端,不是推举“底层写作”、指责“九十年代诗歌”的技术至上主义,就是以“九十年代诗歌”的审美自律来抵制“底层写作”的粗鄙、简陋。如钱文亮捍卫诗歌自身的伦理法则,批评有些提倡“底层写作”的批评家往往表现出动辄以“立场”“态度”“伦理”等庄严的大词臧否诗歌、褒贬文学的痼习^②。虽然文中没有具体涉及“九十年代诗歌”,但就其强调诗歌的“审美自律”相对于“底层写作”所谓的“时代精神”的优先性而言,其论述思绪、所用资源仍然紧紧关联“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意识”,不过在这里,没有挑明的“九十年代诗歌”成了“审美自律”的代表。2008年,“地震诗”的热潮引发了持续争论,同样也触及了类似“诗歌如何承担历史”的思考。^③在众多批评中,批评家张桃洲的态度较为微妙、谨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他指出并不是所有重大事件必然会催生优秀诗篇时,暗中辩驳的却是指责“九十年代诗歌”不能反映时代苦难的相关批评。随后,他重申20世纪90年代广泛引用的爱尔兰诗人希尼的名言,强调诗歌的审美自律对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

① 陈超:《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具体批评见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③ 在诗人或批评家普遍地正面聚焦于诗歌在类似“汶川地震”的重大事件中如何发声的问题时,冷霜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的另外维度:“到了2008年的‘地震诗潮’,这种关切更广泛地显示出来。但‘地震诗潮’的情况比较复杂。在2003年‘为徐天龙写诗’的行为中,已经出现了商业运作的痕迹,最初提出倡议的发帖人是说要‘重金征稿’,如果有人为这个事件写诗,报酬由他和作者商议,并且希望授权由他来把这些诗成一本诗集。这个事情最后怎样了不清楚,似乎没有下文。但‘地震诗潮’中,就非常明显地能看到出版商以及文学期刊的运作。我当时收到过一些邮件和短信,都是说急需诗稿,要求什么时间之前写出一首跟汶川地震有关的诗,会尽快出书或出刊。这里面也许不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对于日渐衰落的文学期刊来说,也是希望能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公众视野。”详细参见冷霜的《近年诗歌中的关切》,该文收录于“青年文艺论坛”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d62141901010r03.html。

的矫正压力的独立性,委婉地为“九十年代诗歌”辩护。^①但在分化严重、问题错综复杂的社会现状前,他又和钱文亮一样,不禁表达出如下的焦灼:“在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值得反复探询的问题是:时代的苦难向语言(文字)转换时为何常常‘失重’?”^②他的建议是:“诗歌重获自身尊严和力量的有效手段或许在于:如何建立诗歌与社会间的新的张力关系。”^③

仅仅通过以上简单的勾勒就可以看出,无论陈超以“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想象力”为标准来批评新的诗歌现象,还是林贤治等推举“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指责“九十年代诗歌”缺少“道德、良知”,甚至张桃洲、钱文亮等强调诗歌“审美自律”相对“时代精神”的优先性,在指责与辩难、“吁请”与“澄清”中,因为反思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非历史化倾向”,20世纪90年代发展出来的“如何处理历史”这一诗学问题,不仅没有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社会语境趋向复杂表现出对“历史”的开放性理解,反而逐渐脱离具体、复杂的社会语境,被脱脉络化地简化为“伦理与诗歌伦理”“道德与诗歌道德”“诗歌的艺术自律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这样二元背反的诗学论题。

关于“历史意识”,在“九十年代诗歌”的自我阐释与建构中,诗人臧棣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他认为“九十年代诗歌”有两大主题,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个人化”。也就是说,“九十年代诗歌”的代表诗人在“如何处理历史”这一问题上摆脱了“历史决定论”下宏大叙述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历史自由的敞开,呈现出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多重叙述面貌。^④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个人化”这一“美学的多元主义”

① 张桃洲:《诗歌与社会:新的张力关系的建立》,《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有些诗歌批评家试图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来概括“九十年代诗歌”中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如臧棣曾在访谈中提到他试图将“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结合起来,用于当代诗歌批评(胡旭东:《诗歌·批评·文学史——访臧棣博士》,《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1998年第1期)。他于1998年提出“历史的个人化”这一说法,无疑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启发。诗评家陈超也在“先锋诗歌”与“新历史主义”之间建立关联:“‘历史想象力’的提出,也与后现代思潮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的启发有关。这些诗人意在深度关注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探询历史话语、历史修辞,就是为着实现更有效的对当下的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见陈超:《重铸“历史想象力”》,《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过程中,“当代诗歌虽然享有一种从‘大历史’中脱颖而出的权力,价值的批判与选取仍是不能回避的”^①。而“历史意识”不仅指向包容“历史”所需要的特殊的语言技巧与想象力,同时也意味着透析现实所需要的历史视野与判断力。^②不同诗人彼时在处理历史时,虽然分享着某些基本的共识,但其独特的诗学资源和关怀导致其言述与处理方式也极为不同,而这种差异,随着社会现实也即“历史”剧变带来的认知深化,引发了更为根本的差异、分歧甚至剧烈冲突。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不同的历史认知态度将不会仅仅停留在“历史的个人化”的论述表面,更是诗歌写作者“历史意识”中的关键因素,伴随着写作进程的持续,反而会突破诗歌的审美层面,凸显出与变动的社会历史的纠缠关系。而根基于不同历史认知态度的诗歌,也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关于文学生活的理解,而这样的理解也将不再一如既往地陷入“伦理”与“美学”二元冲突的窠臼中。

如果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批评继续审视,还可以发现,在“九十年代诗歌”自我阐释与建构过程中,诗人及批评家往往受限于彼时针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辩驳、反思立场,更出于对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提倡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警惕,过于谨慎地把“历史意识”仅仅理解为“诗歌审美为历史留出了空间”。这一自我阐释的保守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诗歌发展进程中尤其凸显,因为随着社会历史的自身变化,“历史意识”这一内涵模糊包容却又极为广泛、灵活的诗学概念,也不断扩展为一个具有生长性但兼具纲领性的视域,或者说“历史意识”有自己的变形记。从某种意义上讲,“九十年代诗歌”提出“历史意识”这一概念,只不过是诗歌写作处理“历史”的权利提供了合法性的辩护而已。彼时许多诗人或批评家并没意识到一旦诗歌试图处理包括改革开放后剧变的现实生活在内变动的“历史”,就不可避免地要纠缠在“历史意识”这个内涵含混、意蕴深藏且与时俱长的概念中。因为“历史意识”不

① 张桃洲等:《重新深掘新诗批评的活力与效力——从臧棣对林贤治的反驳说开去》,《新诗评论》2007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3页。

② 在讨论诗歌如何承担历史、介入现实时,冷霜辨析出常见的表述中存在微妙但重大的政治立场分歧:“我想当我们表述文学应该关心时代、关注现实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多左翼的性质,但当我们说诗歌能否参入中国的历史进程时,它不只是左翼的,还有右翼的成分在里面。”见张桃洲等:《重新深掘新诗批评的活力与效力——从臧棣对林贤治的反驳说开去》,《新诗评论》2007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仅意味着诗歌要以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讨论并认识当代生活的情感、经历、欲望,也为诗歌摆脱主宰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主流写作趋向,从而与当代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保持一种较为紧密的同步联系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因为介入并处理“历史”,自然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新老诗学问题,比如曾经搁置不论、以种种变形方式存在的老问题——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关联与分歧,都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新的社会历史状况与政治结构中重回人们的视野,故而不妨说它提供了一种摆脱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已成认识定势的文学/社会政治判断、重获社会想象力的诗歌契机。相比于 1949 年以后“左翼”话语逐步取得统治性地位且日趋僵化与单一的“历史叙述”,对应于学科规范分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及其以后进一步强化,韦伯探讨的“理性化进程”带来的思想领域的专业分化问题深深影响到当代社会思想,如果不是视而不见的话,历史意识又使文学与不断深进的“历史”“哲学”“政治”专业关联的老问题不可避免地纠缠在新的矛盾中。

此外,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实践与相关批评,还可以看到“历史意识”作为一个生长性兼顾包容性的总体性概念,在“九十年代代表诗人”的写作实践中有着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总体趋向:最初“历史意识”的提出是作为对当时特定阶段的历史事件的自我反思反映到诗歌写作的调整上;随后,也就是 1995 年前后,则转入了当下日常生活——粗略地说,是市场经济下的当代日常生活——的抒写,也由此从这一概念衍生出“日常生活”这一子概念;进入 21 世纪后,伴随着社会生活语境的巨变,发生了种种上述已经提及的如“底层写作”等诗学探讨。尽管这些探讨有着种种特定的社会历史问题、诗歌现象,而且不同问题有着不同的概念表达方式,但其实都可以看作当初那个仅仅出于辩驳而提出来的“历史意识”的扩充与发展。如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历史意识”展开了它自身的逻辑运动:各种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活跃的思想,如女权主义、文化左派、儒家社会主义、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在不同年龄层的新老诗人中开花、结果,参与、融汇并激荡着诗歌写作与批评的进程,并在这一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将潜含在“历史意识”背后“文学”和“历史”的矛盾与关联展示出来。当然,这一概念的运动过程,并非如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运动般表现出正反合的有序进程,但这一运动过程还是展现出一种试图打破区隔、重建文学和社会连带关系的总体趋向,而且

也时刻呼唤着贴合情势、与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历史进程相联系的成熟的“历史意识”。

尽管“历史意识”的逻辑运动已经进展如斯，但由于对其内涵缺少深入的持续性与整体性的思考与把握，对“九十年代诗歌”的讨论批评始终停留在某种笼统性的自我辩护与正名的“遗产”维护状态，于是就出现了种种较为有趣的现象和问题。

首先，具体到“九十年代”代表诗人之间彼时的观念差异与分歧，虽已被少数批评家敏锐地意识到，却由于是共同针对“80年代诗歌”的“非历史化”倾向，所以讨论与批评的视野更多地被回收为有着共同的写作立场下风格的差异。比如，臧棣指出了“九十年代”代表诗人的“历史的个人化”倾向，却对如何的“个人化”语焉不详。由于对“历史意识”背后“文学”与“历史”的连带关系理解上的孤立与笼统，随着社会思想焦点的变化与转移，甚至出现了诗歌批评家以此时的“历史意识”指责彼时诗人所表现的“历史意识”落后、无关时代大局的“进步”现象，其中林贤治对以臧棣为主的“九十年代诗歌”代表诗人的批判就很典型。面临这一新的变动与挑战，“九十年代诗歌”的辩护者始终处于极其被动、尴尬的防卫境地，争论也往往陷入“伦理”与“美学”二元冲突的窠臼中。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则是从“历史意识”概念衍生出来的“日常生活”这一子概念。1995年前后，绝大部分诗人将“历史意识”想当然地理解为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理解很少会引发“美学”与“伦理”的心理冲突。随着“历史意识”的逻辑在当代社会中的展开，出自对诗歌最初遭遇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失语、焦虑与尴尬后形成的应激反应，众多诗人于2005年前后表现出对受媒体影响的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与热点问题的各种情绪性的表态。无论积极强调诗歌与社会重大历史现象的关联，还是坚持诗歌伦理的优越性，或者摇摆在两极之间较为模糊、含混的暧昧地带，支配种种应激表象背后的内在逻辑触及了最初提倡“历史意识”这一诗学概念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思想前提。最初提出这一诗学概念时，众多诗人的内在意识结构依然处于20世纪80年代通常的“文学/专制政治”理解的延长线上。在“历史化”的名义下提倡“日常生活”，有针对20世纪80年代“纯诗写作”趋向的反驳，但将“日常生活”理解为“历史”的普遍趋势，暗合了

当时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领域消解宏大历史叙述、提倡“小叙事”的整体氛围。与抒写的“日常生活”相对但没经挑明的是,在这一结构中,“社会重大历史事件”无形中被略等于当时文学意识形态试图要消解或回避的“宏大叙事”。所以,作为“历史”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以现代传媒为工具,癌细胞般突然包围了当代诗人及批评家时,他们都曾普遍地遭遇了失语、焦虑与尴尬。这一症状突出地表明当时很多诗人与批评家并不仅仅在诗歌技艺上,更在社会历史的认知上缺乏准备与理解。在“日常生活”与“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之间,他们进行了分割,而不是放在同一历史视野下理解。因此,如果不从褊狭的“文学/专制政治”的封闭角度而从深度的社会意识来理解,成熟诗人及批评家的“历史意识”将不直接表现在对受媒体影响的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与热点问题的应激反应,而是体现为一个身处变动发展社会中的个人/诗人应该具备一种较为完整的社会意识与认知。这样的社会意识与认知,将内含着对社会重大问题与思想的连续性理解与建议。他们不受局部、偏激的社会情绪、认知的蒙蔽^①,也不纠结于诸如“打工诗歌”“地震诗”“人民写作”这类看似重大而又有影响力的孤立社会事件的表象中,而是对左右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问题与思想有着更为清醒、整体的认知。这样敏锐的社会认知,从诗歌写作的实践来看,往往有可能恰好通过并不那么吸引人的社会现象就能剧烈集中地反映出来,甚至如冷霜曾极富辩证地指出的那样,“写作的‘历史意识’并不必然指向写作与历史之间的文本关联”^②。即便如此,对于一个成熟诗人来说,这样的“形式主义”写作的前提依然是成熟的“历史意识”:“我们注意到我们

① 已有诗人批评家关注到了当代社会思想状况与诗歌之间的互动。在“青年文艺论坛第十三期:中国‘新诗’的现状与前景”上所作的报告——《近年诗歌中的社会关切》——中,冷霜谈到“当代诗歌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关切背后所浮现出来的政治意识”:“近些年,一些诗人在写作中开始表露出更明确的政治意识,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如何做一个总体判断,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厘清自己的立场?可以看到,90年代末思想界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也已经在诗歌界,至少是其中一些诗人中产生了影响,不同的诗人已经在运用不同的思想和话语资源来理解当代社会,并体现在各自的写作中。当代诗人在表达社会关切或表露政治意识的时候,很多时候能看到是一种泛自由主义的观念。但这些年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形,也有一些诗人自觉地借用左翼的思想资源来书写现实。”引文来自“青年文艺论坛”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9d62141901010r03.html。

② 冷霜:《九十年代“诗人批评”》,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

周围的强硬的浑浊，我们完成了一场艰苦的清理工程。”^①

此外，2011年前后，“九十年代诗歌”的几位代表诗人发表了他们写作史中极为重要的长诗，连同将近封笔前张枣的《大地之歌》（1999年）^②，“历史意识”这一诗学概念的自身运动与发展也出现了阶段性的高潮。这些长诗无论是处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题材，还是勾连过去、剖析当下，从容量广度、主题深度、处理手法上，都已经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也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这一概念内在的矛盾与问题，为重新审视并深究“历史意识”提供了契机。^③ 相对于诗人过去写作的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短诗或长诗，如何处理历史文献材料的问题在这几部长诗中凸显出来，因而这使诗歌的写作与当下历史学的前沿的关系成为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意识尚未在过去的批评视野里出现。

上述理解“历史意识”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意味着要突破已有的对“历史意识”越来越简化自明的叙述，不再泛泛地将之归类到统一的写作现象中去，而是重新历史化，回溯到“九十年代诗歌”代表诗人具体的诗歌实践与观念阐释中去，探究在“九十年代”这一共同的历史语境下他们之间观念与实践上具体的差异与分歧。这些差异与分歧在新世纪变化的历史语境下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呈现，导致20世纪90年代归属于同一写作团体的诗人对诗歌功能与构想的认识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因此，排除时间与社会经历带来诗学意识调整的影响外，诗人们的差异并不能仅仅用风格加以概括，反倒可以在他们对待“历史”不同的、有所调整的立场中获得更为准确的理解。

与对“九十年代诗歌”“历史意识”越来越简化自明的叙述与理解相关，在最近十多年的诗歌倾向中，对写作“可能性”的理解也渐趋保守，甚至“可能性”在相当多的诗人那里变成当代诗歌的“政治正确”。从历时

① 萧开愚：《当代诗歌的一些文化触角》，臧棣、萧开愚、张曙光主编：《中国诗歌评论：力争上游》，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② 诗人批评家张伟栋对张枣的《大地之歌》表现出的“历史意识”进行了解读，详细参考张伟栋：《“鹤”的诗学——读张枣的〈大地之歌〉》，《山花》2013年第13期；《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江汉学术》2015年第1期。

③ 有关这几部长诗的讨论，可以参看姜涛：《“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